

Myself and China

我与中国

[美] 罗斯·特里尔 著

Ross Terri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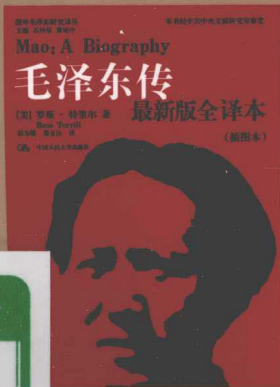
刘庆军 许道芝/译 萧延中/审校



《毛泽东传》

作者罗斯·特里尔又一部力作
全面解读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作/者/独/家/授/权

全球首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I712.55

63

Myself and
China
我与中国

[美] 罗斯·特里尔 著

Ross Terrill

刘庆军 许道芝/译 萧延中/审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中国 / (美) 特里尔著; 刘庆军, 许道芝译; 萧延中审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300-12596-1

I. ①我…

II. ①特…②刘…③许…④萧…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3939 号

我与中国

[美] 罗斯·特里尔 著

刘庆军 许道芝 译

萧延中 审校

Wo yu Zhongg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3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366 00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周恩来总理微笑着问我：“你在哪儿学的汉语？”

“美国，”我回答道，同时对这个世界著名的总理竟然能够听懂我带澳大利亚口音的不标准的汉语感到有点震惊，更没有想到他会对我的研究感兴趣。

那是1971年，马毓真（后来的中国驻英大使）将我引见给周恩来。那时我正陪同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后来的澳大利亚总理）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晚会。

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是影响我人生的三个国家。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孩成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又通过个人和职业的方式接触到全球化时期的中国。一个澳大利亚乡村男孩最后来到中国的城市，观察到那里人们的生活。一个在对中国充满恐惧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朝鲜战争后，渴望叙写他与中国人民的交往。

196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当时国际形势不好，冷战笼罩着整个欧洲和亚洲。当时亚洲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出名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蓬勃发展。它们将会向何处呢？一个外国作家能了解中国吗？

第一次访问中国6年后，也就是1970年，这时我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教师，我被要求陪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参观哈佛大学的校园。我安排好他在哈佛室内泳池游泳后，离开了一个小时。进餐时，他告诉我他想去燕京图书馆看《人民日报》。“因为我读到的是宣传报道，”他谈到报纸《北京共产党》（李光耀在新加坡不允许该报发行），“所以我突然想知道美国人究竟是怎样通过窥视观察达到了了解中国这样的社会的。”

“我们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我对新加坡总理说，“我们根据我们的意

愿建构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着去认识真实的中国。这样，我们会适时修正我们已经形成的认识。我向李光耀建议，认识到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任何时候，想完全了解中国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

2008年我的两个经历反映出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变化。陆克文总理邀请我到华盛顿的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馆共进午餐并讨论中国的一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期间，陆克文作为外交官曾住在北京。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然而我过去所认识的从惠特拉姆到陆克文的前任者之间的五位澳大利亚总理中，没有一个人会说汉语。陆克文跟我进一步谈到对中澳关系的希望。他赞赏布什对中美关系的处理。由于陆克文将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他还问了我对西藏和其他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

四个月后，2008年7月，也是在华盛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出席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国研究所的落成典礼。2008年的我已经是该中心的一名公共政策学者了，应邀从波士顿回来参加这个典礼。

在庆祝午宴间，我昔日的教授基辛格跟我热情地打招呼。他说：“哦，我经常看你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85岁的他显得开朗而敦厚。尽管他行动比较迟缓，但是看起来依然精神抖擞。

我说：“你能帮参议员麦凯恩赢得选举吗？”

“我们尽力，”基辛格很干脆地回答。但是那天的主题是历史，而不是政治。基辛格说：“近40年来我一直坚信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动摇过。”确实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基辛格重视中美关系的原因并不总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记录。正如桌旁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所说，“基辛格本人就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到2008年，20世纪70代早期（我依然记得那时会见周恩来时的兴奋）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三者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已经制度化为富有成效的结构。“中国与美国不再有共同的敌人，”基辛格说，“但面临共同的机遇。”这也是一句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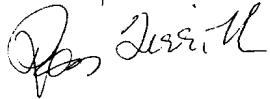
自我长大后，中美关系的建立或缺失都影响着亚太地区。二战时，日本侵略中国，向美国宣战，轰炸澳大利亚北方；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结成了反法西斯

同盟。

自二战结束 5 年后，如果没有中美敌对状态，朝鲜战争就不会爆发，这场战争巩固了中苏阵营，使冷战明朗化。令人震惊的是，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与毛泽东的握手消除了中美战争的威胁。它使得两极世界变为三极世界，迎来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时期。

进入 21 世纪后，中美两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同亚太地区的这两大巨头建立了伙伴关系，在亚太地区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本书是关于过去半个世纪期间的这些主题和事件的一些个人看法——尽管这些事情还没有结束。我相信中美关系将关系着我们的成败。

罗斯·特里尔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01

澳大利亚镜像中的中国

CHINA IN THE MIRROR OF AUSTRALIA

我在旧金山做翻译时，曾与菲莉普·亨特和奥蒂斯·威德曼这两位澳大利亚人相处过。他们对我很友好，也愿意与我分享他们在澳大利亚生活的经历。

第二章 15

抵达北京

I GET TO BEIJING

这个时期，很少西方人能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澳大利亚人需获得本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去中国，尽管有些人获得了批准，但是北京对来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的大规模签证是非常谨慎的，仿佛检验珍珠一般。

第三章 27

哈佛镜像中的中国

HARVARD'S CHINA

在尼克松新任总统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访美期间来到了哈佛。我、李光耀以及一些中国“专家”一起吃了一顿午餐。……这确实就是1968至1974年尼克松任内期间在基辛格建议下展开的工作。他很谨慎，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美国离开亚洲。

第四章 41

两个文化革命？

TWO CULTURAL REVOLUTIONS?

比起“文化大革命”，我对阶级斗争理解得更有限。我认为，阶级理论只适合社会阶级分化特别严重的特定历史阶段，这确实符合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

第五章 51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朋友

CHINESE FRIEND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毛泽东统一和巩固了中国，但是他不能改变人性。他不能消灭官僚主义、等级感、尊严感，人们对物质主义的偏好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第六章 61

从越南、香港地区和东欧看中国

VIEWING CHINA FROM VIETNAM, HONG KONG, AND EAST EUROPE

反思中国情况时，我是将越南、香港地区和东欧国家作为参照的。中国政治已经影响到许多国家和地区。

第七章 73

历史的参与者

PARTICIPANT

在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这是20世纪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第八章 85

热情高涨的华盛顿

EXCITEMENT BUILDS IN WASHINGTON

周南对五洲大柱文件泄密事件很感兴趣。当时美国还并未公开此事。他问道：此次非法泄露关于越战的文件，会让哪一方受益，共和党或民主党？

第九章 99

改变世界？

CHANGING THE WORLD?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这是20世纪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第十章 111

见过的人，到过的地方

PERSONALITIES AND PLACES

由于促成了澳大利亚工党派代表团访问北京，我在中共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部长的亲切接见。

第十一章 121

讲述中国的故事

WRITING THE CHINA STORY

从中国回来，费正清和我那时一样，绞尽脑汁地去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我考虑的重点是自由和多元化；费正清则关注现代化以及中国共产党能否鼓励作为现代化前提的自由。费正清的确是“进步人士”，我则偏向关注价值观。

第十二章 133

通向中国

SPEAKING OF CHINA

我喜欢这儿的山，它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或在旧金山市的任何一处，远远望去都能看到蜿蜒的山脉。它提醒了城市的广阔，给人无限遐想。但我不得不回到现实，继续在哈佛教书和做演讲的事。

第十三章 143

奇怪的朋友，移民及历史变化

STRANGE BEDFELLOWS, IMMIGRATION, HISTORICAL CH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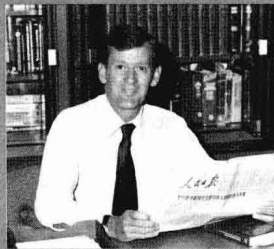
华裔白领午餐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生动地揭示了左翼和右翼是怎样看待中国迅速发展的一股隔阂的。

第十四章 155

惠特拉姆飓风

THE WHITLAM TORNADO

1972年12月1日至2日午夜，我在哈佛大学办公室得知澳大利亚选举结果。经历22年后，工党再次成为执政党。我给惠特拉姆总理发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第二天惠特拉姆也给惠特拉姆发去贺电。



第十五章 169

逆流：冲突与碰撞

CROSS-CURRENTS

访美的美国，我意识到中国的国内政治精英仍很年轻。我在北京外交部的“中国事件”展览后，意识到这个展览是非确切的“大飞那那”本馆于美国内战前，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风向标”。

第十六章 187

哈佛眼中的新中国

A NEW CHINA FOR HARVARD

我当时在讲“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台下很齐，白穆德和其他委员会成员尽力在讲座中表现得十分自觉。白穆德带了一个绿帆布包，看起来好像近40年前在哈佛读本科时用过的。

第十七章 201

中国城市的变化

URBAN CHINA'S CHANGING FACE

1975年秋天，我在日本，中国领导人访问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了回顾。1974年秋天哈佛世界事务中心，我参加了“中国”会议。会议在哈佛大学，会议也在哈佛大学小楼。

第十八章 217

逝去与新生

LOSS AND REVIVAL

1976年1月8日于1月4日，邓小平刚复出时，我随同其随行人员访问北京。我写下了这篇日记。他要求我在五天内写出一篇文章。第二天即着手写稿，并信了“恩恩”的“恩”。这篇日记在《时代》杂志上，标题为“支持中国政治前途的领导人已经逝世了。”

第十九章 235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发展的局限

NORMALIZATION—AND ITS LIMITS

基于美国人而言，中国确实一个很快发展的国家

第二十章 251

讲学，研究，“毛泽东研究小组”

LECTURES, RESEARCH, "MAO"

离开中国返回波士顿时，我在日记中写道：“明天起，我就会怀念中国的艰苦历程，茶观幽默。然而我期望有中国与西方今后更紧密的往来。”

第二十一章 269

里根与邓小平

REAGAN AND D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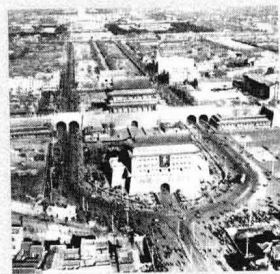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中共领导人又记：“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相悖之下，邓小平摒弃了单一的、过于简化的解决方案，这是值得赞扬的。他是摸着石头过河。

第二十二章 283

艰难历程

DIFFICULT HISTORY

很令人吃惊，尽管中美关系正常化，人们却更怀念毛的讲话。他们希望相信，他们知道中美发展的方向，但想“警告那些批判者错了”。他名头很高，但到1988年时，就几乎没有再进过中央党校。



第二十三章 297

友谊之树枝繁叶茂

FRIENDSHIPS FLOURISH

在邓小平时期，中共共产党开始与许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我作为访问团成员，其目的之一就是去北京。在访问中，我见到了邓小平。他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在访问中，我见到了邓小平。他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在访问中，我见到了邓小平。他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

第二十四章 313

跨越崇山峻岭

BEYOND THE MOUNTAINS

我在四川度过了一段在中国最愉快的时光。四川是邓小平的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为表彰我对四川的宣传介绍，给我颁发了一张荣誉证书和一块漂亮的蓝色丝织桌布。

第二十五章 327

中国阔步向前

CHINA STRIDES AHEAD

有时我想，我是否应该写更多关于邓小平的传记。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

第一章

澳大利亚镜像中的中国

China in the Mirror of Austra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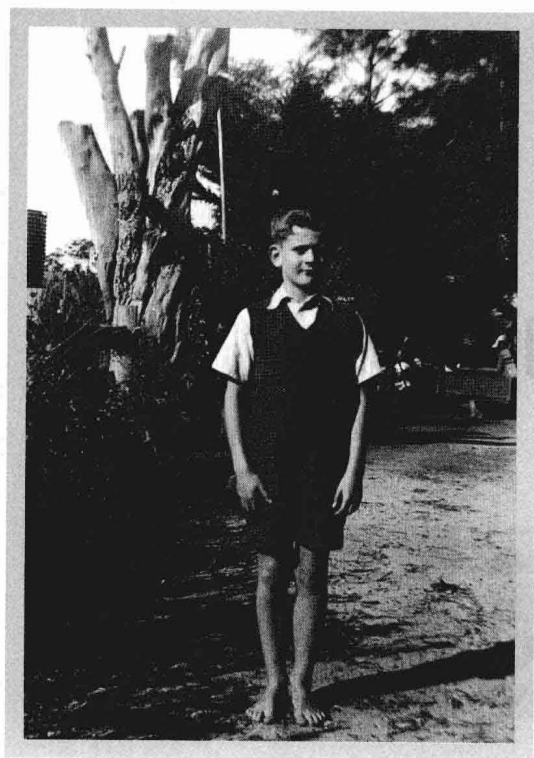


我成长在澳大利亚丛林，也就是所谓的乡村。我父亲是这个小镇中心学校的老师。我母亲是我父亲的助理教师。布鲁兰坐落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以东 200 英里的青山翠谷之中。回想起来，仿佛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耳边仍回响着布鲁兰之夜那铃鸟悠扬的鸣叫声和枝树林里微风的叹息。



依我看，中国和印度将是影响未来澳大利亚的两个重要国家。在报告中我这么写：“有哪一个国家像 1960 年印度那样在一年内受到赫鲁晓夫、周恩来、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访问？”然而，当老师们赞赏印度的民主道路时，我却想知道中国高速度集中的道路会不会更加有效。





1949年作者在南澳大利亚布鲁兰上小学

我成长在澳大利亚丛林，也就是所谓的乡村。布鲁兰是维多利亚州东南部的一个偏远小镇，只有 600 人。我父亲是这个小镇中心学校的老师。我母亲是我父亲的助理教师。布鲁兰坐落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以东 200 英里的青山翠谷之中。回想起来，仿佛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耳边仍回响着布鲁兰之夜那铃鸟悠扬的鸣叫声和桉树林里微风的叹息。

我们很少接触到国家大事。就是墨尔本对我来说都很遥远。这里自然淳朴，当地人随意聚居在这片荒芜却美丽的土地上。在布鲁兰，孩子们大多光着脚去我父亲的学校上学。我和我哥哥只有在星期日去教堂时才会穿上鞋。这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这样更加亲近自然。这里气候温和。阳光烤着我们的小脚丫，走在软土和绿草铺就的小道上，感觉是那样的温柔。不过，我们要小心偶尔会有蛇。

1941 年某天早餐时，收音机播出一条新闻，在悉尼海港发现了两艘日本潜艇。父亲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日本人在离东京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呢？一个四岁的男

孩不懂得战争，但是我们小镇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日本人是“坏的”。不久，1942年，日本轰炸了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澳大利亚丛林里的人们对亚太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美国大兵来这里帮助抵制日本侵略，保卫澳大利亚，也给童年的我带来了包装精致的糖果。我们听到了美国财富和实力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跟我们是一边的。外祖父从他的中国朋友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事情。

20世纪40年代确实有许多亲戚朋友就住在墨尔本，祖父还在那里认识了中国人。他利用晚上时间在墨尔本的唐人街教中国商人和工人英语。一个世纪前许多中国人来这里淘金，在这些窄小的散发着芬芳的唐人街，他们的后裔开了店铺和餐馆，还组织了民间团体来帮助新来的中国人。对于许多普通墨尔本人来说，“中国”的印象主要就是从唐人街进进出出的洗衣工那里得来的。

在墨尔本祖父卧室的墙上挂着两幅精美的软木雕刻画，描绘的是中国南方的景象。金黄色的樟木画框用一根细绳向前倾斜着挂在墙上。这是祖父夜校的中国人出于对他志愿教学的感激而送给他的纪念礼物。我常凝视这些画，上面有湖、亭台楼阁和小山，以浅蓝色的布作为背景。这些画芳香而古朴，一点也不像祖父郊区家中充斥着的那种塑料制品的现代味道。我曾尝试去想象澳大利亚之北的这片土地。大人们只是告诉我中国古老、辽阔，一片混乱。

20世纪中期，在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丛林中一个孩子对于中国的想法，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一定会感到怪异。这就是生活。我们来自一个特定的环境；我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学习生活；我们努力将原有背景和日后经历融为一体。

黄金将中国人和澳大利亚联系到了一起。19世纪50年代早期，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清朝对英国侵略问题的笨拙处理，中国人远航来到澳大利亚淘金；更早些时期，他们就已在美国圣弗朗西斯科淘金了。数十万人蜂拥至此。结果不久，维多利亚金矿上20%的人是中国人。在十年中，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了三倍，突破了100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人的涌入。

许多船只从广州南下澳大利亚，使其北部的库克镇（以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的名字命名的）成为继悉尼之后的澳大利亚第二大港口。这些船只满载着中国人对黄金财富的希望，经过新加坡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停靠港库克镇。

今天的库克镇没有布鲁兰那么大。但是它拥有淘金热时期的三大公墓。一个是

黑种人（澳大利亚大陆原始土著居民）的，一个是欧洲人的，也就是19世纪澳大利亚所谓的白种人，还有一个是中国人的。当1987年我要为美国杂志《国家地理》写一篇报道而参观这些公墓时，我发现这三大公墓中最大的一个仍然是中国人的。

像来澳大利亚的其他人一样，中国人也是乘船而来。上万年以前，原住民途径许多岛屿从西亚向东迁徙到澳大利亚。大多数后来者，无论出于法律、气候、经济或者政治的原因，也是乘船到澳大利亚的。这一定程度上因为，到17世纪时欧洲的船只已比亚洲的更为先进——不像15世纪，那时中国虽然拥有先进的船只，但是不去开拓殖民地——是白种人的到来结束了当地原住民的长期隔绝状态，中国人倒成了后来者。

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给布鲁兰留下的一个遗产是紫罗兰，一个吸引我的黑发端庄的小姑娘。她的父亲是当地的药剂师，是20世纪40年代这个小镇唯一的中国人。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并不知道我的初恋女友居然是半个中国人。孩子们对种族没有太多的了解。在之后的岁月里，受《国家地理》的委派，我去了趟四川省，知道汉人和西藏共同居住的村庄的孩子们并不在意他们的伙伴是否跟他们是同一个种族。但是今天我想知道紫罗兰怎么看待20世纪40年代那些常见的标志，一般是吹嘘澳大利亚防御系统的质量和标志，这些标志常用紫漆漆在大箱子里和一些澳大利亚的家具上，写着：仅欧洲劳工制造。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

1950年作者和他的中国女友在布鲁兰参加化装舞会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开始执政几个月后，也恰是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父母将家从澳洲丛林搬到了墨尔本。这是为了我、姐姐和哥哥能够进更好的学校读书。我无奈地穿上了皮鞋。我戴着帽子，打着学校的紫色和黄色相间的领带。我推测了我的未来，放弃了自然科学，选择了历史和政治。

我的高中老师们主张关注中国和亚洲其他邻国。他们提倡经济平等原则，传播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这些老师使我明白，20世纪50年代亚洲和非洲的反殖民运动更多地是获益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当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我不知道什么政治立场。我只知道几个简单的事实。日本轰炸了澳大利亚北部。英国是澳大利亚的老朋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我们。中国赫然横跨我们的亚太版图。

朝鲜战争令我们害怕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可能经过马来西亚向南渗透以控制澳大利亚（就像过去日本计划控制我们和掠夺我们的自然资源那样）。一些政治团体绘制了那个区域的地图，用大的红箭头标注在各个不同国家上面，所有的箭头都是从中国出发的，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中国香港到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最终的目标指向澳大利亚的辽阔大陆。

1957年我成为墨尔本大学的本科生，教我的老师都是左翼人士。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并不是毛主义者。他们相信，无论如何，能够与共产党人取得谈判的成功，华盛顿倾向于扩大它的影响，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是世界的希望。他们认为社会应该不断进行自我变革，从而不断地取得进步。

尽管老师们对亚洲的看法相似，然而他们每个人却有着不同的背景。麦克马洪·鲍尔教授是1945年后对日联合理事会的英联邦代表。虽然该理事会设在东京，但也要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打交道，麦克阿瑟的飞扬跋扈使他对傲慢的美国风格有了戒备。鲍尔感到美国的这位著名将军认为他仅仅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而已。不过，他认为美国二战后对日本的占领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鲍尔在课上告诉我们，在东京看来，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盛行。他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视为对西方的巨大挑战，因为它是享有爱国合法性的共产党政权。鲍尔在他的《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得出结论，许多亚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融合能否成功。他强烈要求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不要因为抵制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而将其推向北京的怀抱。”在

李光耀和其他人开始强调“亚洲价值观”之前，鲍尔就认为该地区，特别是印尼，各种民族主义构成了亚洲价值观，澳大利亚对此应该予以尊重。

不过，这是澳大利亚早期的亚洲研究。鲍尔是墨尔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他不会汉语、日语及其他任何的亚洲语言。

中国现代史课的老师格雷戈里博士是他那个时代与立场的典型代表。他受的是英国教育，他是根据英国对东亚的理解来研究中国清朝的。他写了本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书：《大不列颠与太平天国》，现在仍然是西方国家大学的阅读书目。这本书的书名就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还包括许多西方国家）是如何讲授所谓格雷戈里课程“东方历史”的。中国是被作为西方扩张的对象而加以研究的，是西方冲击的对象，是对西欧和北美主导的世界的回应。

在格雷戈里博士的课上，我写了篇关于1843年《南京条约》的小论文。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清晰地感受到鸦片战争在广州所唤起的激情。清廷与伦敦彼此完全误解了对方。但是，原因远不是那样简单，导致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危机中的中国与发展中的英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衡。

教我中国政治课的老师阿瑟·哈克，却有着另一种背景。澳大利亚为了应对外关系中军事和政治的挑战，最近采取的一项战略性步骤就是讲授汉语，他就是受益于此。在维多利亚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军方创办了一个语言中心，哈克就在此学习汉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所持的是谨慎但相当同情的态度。他强调我们应该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我们开始熟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学生在墨尔本商业区的左翼书店里也抢购北京外语出版社的其他书。我是那么急切渴望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后来在某种魅力的吸引下，我又研读了第二卷中的《反对自由主义》。

有一周，出生于英国的历史学家费子智给我们上课。他是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的作者。1949年之前，费子智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官员，在中国北方生活了多年后的他显得饱经沧桑。他在给我们上课前不久又去了趟中国，参观了一些新建的公社。他告诉学生，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中国人热情高涨地证明着毛泽东的创造性。

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是很有限的。当时有新华社通讯。这些通讯宣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钢产量跃居前列……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到北京



1951年北京集会反对美国入侵朝鲜

“向毛主席致敬”。可怕的谣言也从香港流传到澳大利亚。一些愤怒的中国难民逃到西方后大肆渲染在中国的苦难境况。墨尔本和悉尼的毛主义者里也有意识形态的辩论；愤怒的反共分子中包括认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西方传教士。

朝鲜战争后澳大利亚天主教会变得特别反华。确实，左翼工党领导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在主教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反共工党。他们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分散了工党的选票，使得保守派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控制了澳大利亚，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这也是澳大利亚曾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种学说的共产主义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影响；课堂上，我们就坐在共产党员旁边，彼此相安无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澳大利亚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的“友好”团体的成员。澳大利亚共产党就是我身边的生活现实。在墨尔本大学教我苏联政治课的老师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课上通常要

求学生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分析 19 世纪或者 20 世纪的历史事件。我现在仍然仿佛能看到他椅子背后的书架上摆放的一排一排的斯大林著作；仍然能闻到我的那本莫斯科出版的海军蓝色封面的《列宁选集》散发的胶味。

但是共产党员的存在并没有使得每个人都成为共产党员。基督教的影响使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免疫力。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信仰。在工党的学生队伍中，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明白（我们的）社会民主是什么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1956 年赫鲁晓夫发表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演讲后，毛泽东非常惊愕，我们看到我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员出现了骚乱、抗议，或者退“党”。

大学本科时，我不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且读了米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其他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评论文章。我们是远离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中苏论战爆发后，紧跟外部世界形势变化的澳大利亚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分裂成了亲中和亲苏两派，但是我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

后来，20 世纪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北京提出的“新人”吸引了哈佛大学研究院里我的一些同学时，我对毛主义里这种准宗教信仰却没有兴趣。我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一个澳大利亚本土主义者。我从来没有感到严重脱离过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西方主流价值。

亲近自然的澳大利亚过去是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国家。它很少屈尊去瞥一下小新西兰和它的南太平洋后院。墨尔本和悉尼甚至都不去关注澳大利亚大陆那荒无人烟的西部和占有一半领土的北方。澳大利亚将渴望的目光投向了欧美的快车道。它担心亚洲，想知道澳大利亚是否真正属于它。尤其是对待中国，它的心理很矛盾。庞大，但是贫穷。一个古老的文明尚在为实现现代化而艰苦奋斗。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而澳大利亚则是从那里跃然而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澳大利亚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澳大利亚仍继续承认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不过，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澳大利亚都没有在台北建立大使馆，也没有允许在堪培拉建立“中华民国”大使馆。本科时，我帮助组建了一个“承认中国”团体，主张放弃台北，承认北京政权。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而澳大利亚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不承认北京的政策将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第一次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事实可以争辩，但不容否定。”